帝国气度

灿烂辉煌的古波斯文明概览

“从波斯帝国起，我们开始走上历史的联系……波斯历史的开始，便是世界历史真正的开始。”

—黑格尔

□ 李化成 张瑞雪

◎ 横跨三洲的帝国

波斯帝国是波斯人在公元前6到公元前4世纪建立的大帝国，它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汲取东方先进文明的成果并进行创造性的发展，从而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但与其他古老的文明多由农耕民族建立于河畔海岸不同，波斯人源于印欧游牧民族，兴于巍巍伊朗高原。

伊朗高原地处帕米尔高原和亚美尼亚高原之间，北邻里海、图兰低地和兴都库什山脉、科彼特山脉与厄尔布尔士山脉；南滨波斯湾、阿曼湾和阿拉伯海；东缘有基尔塔尔山脉与苏莱曼山脉；西南缘是扎格罗斯山脉，南部有莫克兰山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伊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群山环绕的伊朗高原就像一个大碗。但这大碗之内却多旱少雨，地理环境算不上优越，不过好在也是荒漠、山系、盆地、湖泊一应俱全，所以很早就有人类活动于此。约公元前2000年时，波斯人与同属于印欧民族的米底人一起来到伊朗高原。公元前7到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据说只有10个部落（6个农业部落和4个畜牧部落），一直受米底人的统治。公元前550年，波斯诸部落在阿黑门尼德家族的居鲁士领导下，乘米底内忧外患之机，

决然起事，俘虏了米底国王，占领其首都埃克巴坦那，并在原米底王国的基础上建立了波斯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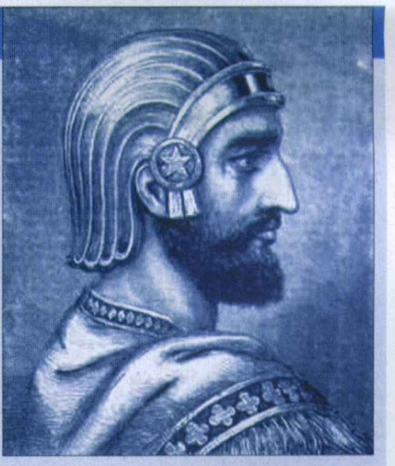
居鲁士马上得王位，也要马上得天下。居鲁士率军先后征服了吕底亚王国、叙利亚、巴勒斯坦，接着又灭亡了新巴比伦帝国和征服了中亚的大片土地。他本想征服埃及，但在与北方游牧部落锡西厄的冲突中，久经沙场的他在混战中被杀。他把征服埃及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后者在公元前525年完成了这一使命。但冈比西斯外功有余，内治不足，一个名叫高墨塔的祭司趁他出征之际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匆忙回国冈比西斯猝死于归途之中。而这却引发了一位千古名帝的出现。他便是大流士一世。冈比西斯出征时，大流士担任国王近卫军的总指挥。归国后，年方28岁的大流士与其他贵族合谋，诛杀了高墨塔，自己登上了王位。大流士登基前后，各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或叛乱。波斯帝国雏形初具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流士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平息了各地的动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公元前520年9月，大流士让人用古波斯语、阿卡德语和埃兰语在贝希斯顿山崖上刻石记功，自成“王中之王”。这位王中之王此后继续对外扩张，使得波斯帝国的疆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达爱琴海和色雷斯，北至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

大流士一世雄心未已，希腊成为了他的下一个猎物。公元前500年小亚的米利都发动爱奥尼亚诸邦起义，反抗波斯对小亚沿岸希腊城邦的统治，雅典和爱勒多利亚派出战舰相助。公元前492年，他以雅典人援助米利都人为借口，发动了远征希腊本土的侵略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希波战争。期间，波斯军队在大流士一世及其后继者薛西斯的率领下，曾先后三次入侵希腊，但在希腊诸邦同仇敌忾的抗击下，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公元前449年，希波双方缔结了和约。然而，“热战”结束，“冷战”未了。波斯帝国虽在战争中遭受重创，但由于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统治根基并未动摇，对希腊的野心也从未放弃，他们试图利用希腊城邦间的不和来破坏彼此间的团结，通过保持对单个城邦的绝对优势继而对整个希腊城邦保持优势地位。然而，就在波斯人对希腊世界处心积虑的过程中，他们自己的帝国也渐渐失去了往日荣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辈帝王的坚韧和勇猛渐渐为其后代的软弱、散漫和放纵所代替，同仇敌忾的王室力量也在无休止的自相残杀中消磨殆尽。波斯帝国是一个以军事力量建立、维系的帝国。随着宫廷内乱的加剧，帝国各民族也不断地进行反抗，对属国的控制权已经落入行省总督之手。波斯沦落为一个尽管富庶却也是只剩下富庶的帝国。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的军队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击溃，维系了200多年的波斯帝国寿终正寝。

◎ 胸怀天下的伟业

帝国之梦并非波斯人的专利，古代的埃及法老、亚述国王以及巴比伦

波斯帝国创立者与末代国王



居鲁士二世（Cyrus II，约公元前590或前580－约前529） 波斯帝国创立者，统帅。出身于阿契美尼德族。前558年成为安善地区波斯人部落首领。前553年领导波斯联盟10个部落反抗米底统治。前550年推翻米底王，建立波斯国家。前546年灭小亚细亚强国吕底亚，并采取分化收买和武力征服政策，使小亚细亚西岸各希腊城邦臣服。前545年领兵东进中亚，占领粟特、巴克特里亚（大夏）等地，渡乌浒河（今阿姆河）直至药杀水（今锡尔河）。前539年进军两河流域，攻占巴比伦城，灭新巴比伦王国。在巴比伦推行宽容政策，尊重巴比伦的宗教和传统，释放此前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使原臣服巴比伦的腓尼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归顺波斯，建立西起地中海、东至药杀水的强大帝国。前529年在与马萨格泰人作战时战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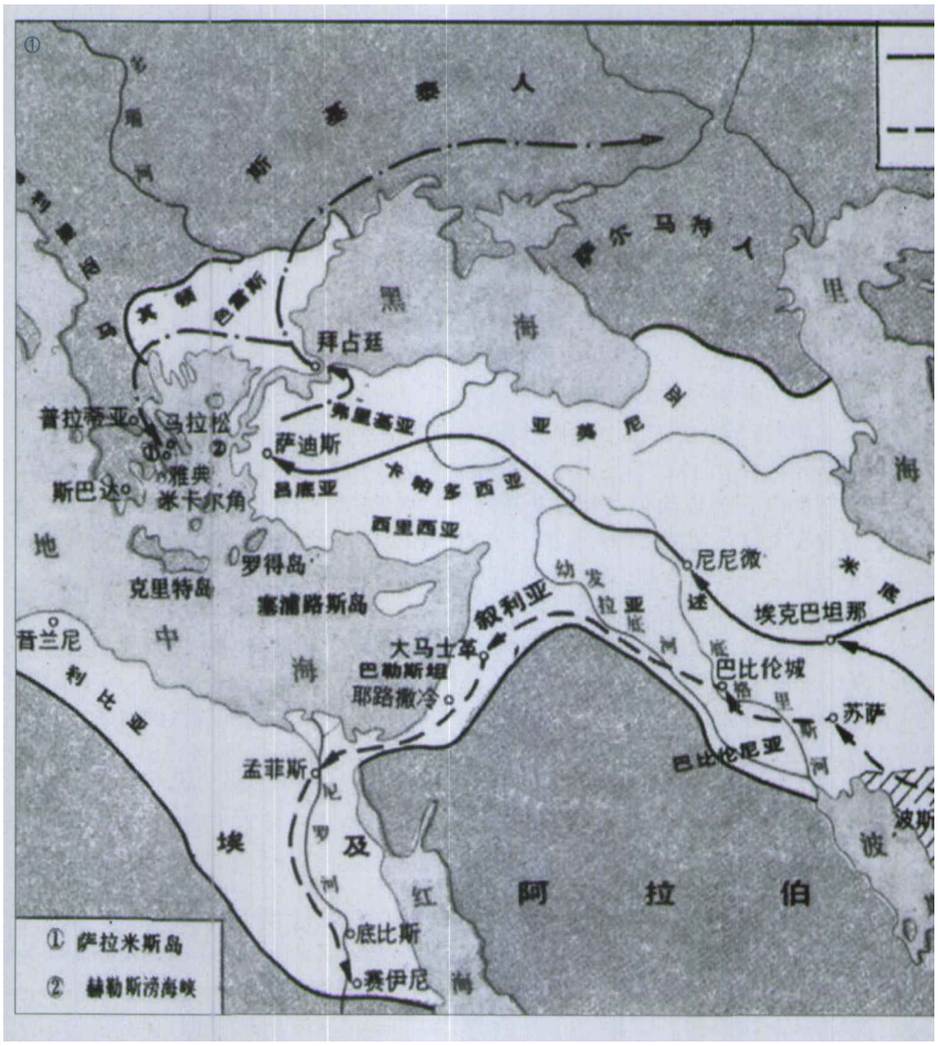
大流士三世（科多曼） 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末代国王（公元前336—前330）。即位前为亚美尼亚总督。公元前335年底征服埃及。在马其顿的威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企图依靠德摩斯梯尼支持，同希腊人结盟。在小亚细亚格拉尼库斯河会战（公元前334）、伊苏斯会战（公元前333）和高加米会战（公元前331）中，他统率的波斯军队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队击败。阿契美尼德帝国在军事和政治上不稳，遂亡。逃往大夏（巴克特里亚，即伊朗东部）后，为贝斯总督所杀。

图片提供：本刊资料室

国王也曾竭力扩展自己的疆土，但在真正意义上建立并有效统治一个洲际大帝国的却是波斯人。要知道，前面几个国家向外扩张时正处于国家最为强盛之时，而波斯发轫之时，伊朗高原的经济算不上发达，世界权力的核心也不在这里。然而，却是相对落后的波斯人成功了。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居鲁士、大流士等波斯统治者胸怀天下的帝王气概和文武兼备的统治技艺。

胸怀天下不仅仅指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更以包容宇内、恩威并施为特征。作为开国之君的居鲁士给其后代乃至后世所有帝王都作出了表率。像古代世界的帝王一样，居鲁士也是用火与剑征服世界，但在征服之后，他对被征服者却极其宽容。每每占领一地，他都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作为本土的合法统治者自居。他对当地贵族优礼宽待，仍使之进入统治阶层。对普通民众既不烧杀抢掠，也不强制迁徙。更可贵的是，他尊重被征服地区的宗教信仰，非常善于利用宗教传统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巴比伦，他保护当地神庙，尊重祭司的利益，甚至让自己的儿子向巴比伦的主神献祭。更与以往统治者不同的是，他还允许那些在亚述和巴比伦统治时期被迫背井离乡的民族回到家乡。其中包括遣返尼布甲尼撒二世掳掠到巴比伦来的犹太人（史称“巴比伦之囚”），并允许他们重修圣殿，建立自治的神权国家。这些措施为居鲁士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犹太人对他感激不尽，认为他就是上帝派遣的救世主“弥撒亚”；腓尼基人也诚心臣服，把他们的战船交给居鲁士，为波斯帝国日后的征伐提供帮助。就连以后的希腊古典作家希罗多德也对他推崇备至，称他为“慈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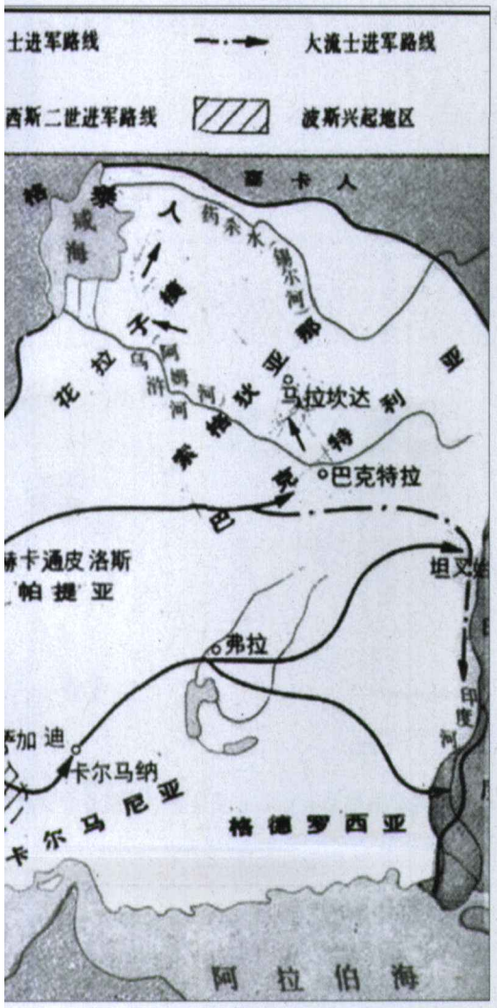
居鲁士之后，真正具有帝王气度和雄才大略的还是大流士一世。波斯帝国虽然疆域广阔，民族众多，但在大流士看来并没有民族贵贱之分。大流士从来未把波斯之外的民族称为“蛮族”或“异族”，而是直呼其本来的名称，显示其尊重。如果说划分，也是超越民族界限的“友人”或者“敌人”。在《贝希斯顿铭文》中，大流士说：“在这些省份中，（每一个）友好的人，我加以恩典，（每一个）敌对者，我予以严



惩。”这样的划分以国家的命运为重，超越了宗教、种族、地域的纠葛，在古代世界中可谓独树一帜。这显然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维持帝国稳定。更重要的是，大流士一世并没有止步于观念上的超越，而是将之落实为制度上的创新。而这也正是大流士的伟大之处和波斯帝国得以辉煌的根本原因。

帝国之道，在于集权。大流士一世继承了先前西亚强国的专制传统，竭力一统天下。在《贝希斯顿铭文》中，他自称是“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从日出处到日落处一切人的统治者，是大海两岸、沙漠两边、山脉与平原的统治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进行了政体改革。在中央以国王为轴心，以“七臣议事会”为主干建立起强有力的集权体制。面对幅员辽阔并且充满多样性的帝国，他则建立了行省制度。他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23个行省，每一个行省范围大致相当于各个被征服国家的疆界。行省总督由国王任命，一般都由波斯贵族和王室成员担任。总督名义上是国王的全权代表，但实际上只掌握行政和司法权力。国王还在总督身边置文书一人，监视其日常举动。行省的军务和财政另有国王委派军事长官和财政官治理。此三人权责明确，都直接对国王负责。这就在行省建立了一种“三权分立”制度，有利于中央控制。与政治上的控制相辅相成，大流士还十分重视用法律来维护统治。正如《贝希斯顿铭文》所云，“在这些国土上，容易相处的人，我善待之；虚妄的人，我惩治之，赖阿胡拉·马兹达的佐助，这些国土尊重我的法律，我所说的他们遵办。”

但是，大流士一世在政治统治上专制却不专断。“大一统”的统治格局下是“小自由”，地方政府在保障王权的前提下，享有较多的自治权。埃及和巴比伦尼亚仍被当作王国看待。在行



省之下的行政也不作重新区划，仍有原来的统治者管理。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各个被征服地区“都保留着它们自己的特性、风俗和法律。各项通行律令对于它们一概都有约束力，但是并不损害它们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性，并且保护它们、维持它们，……有些邦国甚至有它们自己的国王；同时每一国都有它的明显的语言文字、军备、生活方式和风俗礼制”。在法律的施行上，一方面有法必依，“执法不避显贵”。如吕底亚总督(居鲁士时任命)欧洛伊铁司就因违背中央法令被处死，那些因腐败而获罪的贵族更是会被处于剥皮的酷刑。但另一方面，波斯法律有讲求程序完备，执行灵活，量刑适当，没有达到“专任刑罚”的程度。

此外，大流士一世还继承了亚述的驿道制度，在帝国境内修筑若干驿路，形成驿路网。其中最著名的大驿道，从波斯首都苏萨延伸到小亚细亚的萨尔第斯，全程2400公里，途中设驿站110余个，每站都备有信使和马匹。一旦有事，信使便跨马飞奔，站站相传，昼夜不停，3天便可跑完全路程。据说凭此驿站，住在苏萨的波斯国王能够吃到从爱琴海捕捞到的鲜鱼。而今天美国邮政局的座右铭借用的就是希罗多德对波斯信使的赞词：“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寒冬，无论夜色多么朦胧，都不能阻止信使们跑完既定的路程。”驿道的修筑和完善为促进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大流士一世还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和货币，制定官方语言，加强军事建设。这些措施成就了波斯帝国的伟业，也成就了波斯文明的辉煌。

① 波斯征伐图 ② 波斯帝国创立者居鲁士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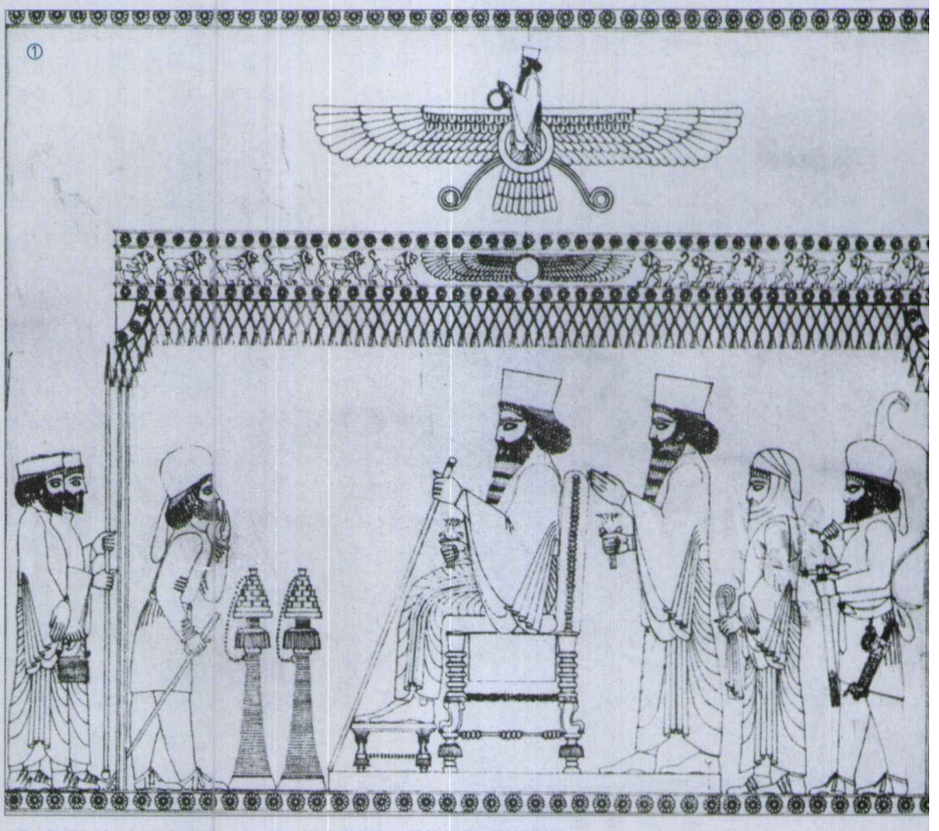
◎ 兼容并蓄的文化

波斯帝国横跨三洲，包括了两河、埃及和印度河三大文明中心，并和璀璨的希腊文明联系密切。如前所述，波斯统治者对其征服的各民族都相当宽容，并且善于吸收其他文明先进的成果。比如，因为觉得漂亮，他们喜欢平时穿米底人样式的衣服，但到作战时，他们又穿坚固优良的埃及铠甲。他们还采用吕底亚人发明的金属货币；又从巴比伦天文学家那里学习夜空图的绘制方法；出海探险时则委派腓尼基水手担当重任。在文字上，波斯人先是采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但当他们接触到简单易写的亚述阿拉米文时，便将之确定为官方文字。然而，波斯人对异域文化又不是全盘照搬，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和扬弃，从而发展出一种兼容并蓄又独具特色的文化。这种特色在波斯艺术上表现最为明显。

波斯艺术主要表现在宫廷建筑上，而这也是继承亚述、巴比伦的传统。由于波斯国王富甲天下，所以调集来自各地的原料，征用各民族的熟练工匠，从而融合各地的艺术风格。波斯宫廷关于建筑的一则铭文可以让我们对此有着直观的认识：“雪松是由黎巴嫩山区运来的。亚述人把它运到巴比伦后，卡里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又把它从巴比伦运到苏萨。柚木是由犍陀罗和克尔曼运来的。这儿用的黄金是由撒尔迪斯和巴克特里亚运来的。这儿用的贵重的青金石和光玉髓是由索格底亚那运来的。这儿用的绿松石是由花剌子模运来的。白银与乌木是由埃及运来的。这儿用的装饰宫墙的材料是由爱奥尼亚运来的。这儿用的象牙是由努比亚、信德、阿拉霍西亚运来的。这儿用的石柱是由埃兰的阿比拉杜斯运来

的。那些加工石料的战俘，是爱奥尼亚的撒尔迪斯人。那些制造金器的金匠，是米底人和埃及人。那些制造木器的人，是撒尔迪斯和埃及人。那些做坯砖的人，是巴比伦人。那些装饰宫墙的人，是米底人和埃及人。”

波斯建筑的代表作是波斯波利斯王宫。波斯波利斯位于今伊朗设拉子城东北约42公里，庞大的王宫就是这个都城的主要部份，建成于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两位国王在位时期。整体来看，王宫的建筑风格属于巴比伦尼亚的凸起平台和阶梯状建筑风格，但与极少使用石柱的西亚传统不同，该王宫却充分发挥波斯高原山区多石的特点，大量地运用石柱。而这显然是受到了埃及、小亚、希腊建筑的影响。王宫依山而建，先凿石台，后立宫殿，气势恢宏。石台之设，是袭自亚述传统，然而其总体布局却未受该传统的束缚，而是根据具体的地势和波斯人以帐幕立营盘的习惯而立。王宫最为宏伟的建筑是国王的会客厅。受埃及神庙柱厅启发，该厅采用柱廊结构，共有36根21米高的石柱支撑顶部。但由于其顶部仍为波斯传统的木质结构，所以石柱较埃及神庙为细，直径为1.6米。柱础和柱头的棕榈纹、莲花纹和垂花饰带有埃及的影响；柱身的凹槽和圆条纹、柱头的涡卷纹则来自希腊的爱奥尼亚柱式；柱顶的有翼公牛和狮子形象则是两河流域的风格，但波斯人却创造性地让两个动物背背相靠，夹住了与横梁对接的的支拱。此外，王宫内各座寝宫和宝库的仓房，都主要模仿美索不达米亚传统，但门窗楣构和石雕等则取埃及式样，室内装修和陈列物品也是汇集各方所长。



① 有关大流士一世的绘画。② 石刻的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

波斯帝国时期的艺术最辉煌的成就表现在浮雕上。在波斯波利斯王宫的台阶两侧，有两组巨大的护壁浮雕，主要题材是国王仪仗、侍从行列和万邦进贡。在人物的刻画上认真细致，带有亚述的严谨之风。但这些浮雕庄严之余又不失典雅灵动，人物的衣褶处理独具匠心，各地贡献的牛羊等动物等更是生动有趣，颇有古希腊雕刻的精髓。波斯的摩崖浮雕和石窟雕凿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大流士命人在贝希斯敦悬崖上刻的浮雕高3米，宽5.5米，风格粗放，气魄宏伟，成为世界艺术殿堂中的瑰宝。波斯人在借鉴埃及石窟墓和石窟神庙形制的基础上，把摩崖浮雕与石窟陵墓结合起来，在峭岩绝壁上雕刻出规整精美的柱廊和墓室，令人叹为观止。

大流士一世（达拉雅瓦乌什）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公元前522—前486）。公元前552—前521年，镇压了巴比伦尼亚、米太、马尔吉亚纳、埃兰、埃及和帕提亚（安息）等地的起义。约元前518年，征服了印度西北部。公元前512年（据希罗多德记述）远征黑海沿岸的西徐亚人失利，波斯军队败退。在位期间，发动了希波战争（公元前500—前449）。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帝国内设军政区（省）；整顿税制；使波斯贵族代表人物聚敛大量财富，取得了总督和要塞长官的职位，甚至拥有对帝国各地的世袭权。还改组军队，由波斯人组成的步兵和骑兵充当核心。他的改革和所采取的对古商道有效管理、开辟新商道、疏浚尼罗河至苏伊士之间的运河（使埃及和波斯通过红海连接起来）、铸造金币（大流克）等项措施，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在位时，大兴土木，建筑了孟菲斯教堂、苏萨宫殿和波斯波利斯王邸等。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为阿契美尼德王朝鼎盛期。但在希波战争中屡遭挫败，国为衰颓。公元前490年马拉松会战时，失败尤为惨重。

◎ 善恶分明的宗教

波斯人从其他地区和民族那里汲取了文明的营养，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和文明。然而，文明的交流是双向的，波斯帝国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随着军队征伐于各地，驿道通达于四野，波斯帝国境内各民族之间及与境外民族之间的交往大大加强了。人们在物质上互通有无，所以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得以把原产于中国的桃和杏传播到了希腊。波斯帝王们宽容开明的统治策略更是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精神文明的交流。不同的文明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仍然可以独立发展，交相辉映。更重要的是，随着波希战争的加剧和东西联系的加强，波斯竟在经意或不经意间成为东方文化向西方传播的主力军，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波斯人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最为人们所称道。该教在中国被称为祆教，又称拜火教，创始人是琐罗亚斯德，一般认为他生于米底，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据说大流士一世的父亲在公元前618年前后皈依该教，并大力支持其发展，从此开始了该教的繁荣期。

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是《阿维斯塔》(Avesta)。该书不仅是宗教经典，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据之以及其他的记载，我们可以洞察波斯人的信仰世界和宗教生活。善恶对立的宇宙观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立教基础。《阿维斯塔》云，在未有宇宙之先，就存在这善恶两大本原的对立。善的主宰是阿胡拉·玛兹达，也是光明之神、正义之神；恶的主宰是阿立曼，也是黑暗之神、邪恶之神。宇宙之始，善神阿胡拉·玛兹达在善本原基础上赋予了无相无形的宇宙以有形的形式，创造了宇宙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其中第一物质为火，并用泥土创造了原人。然而恶神阿立曼率魔众闯入宇宙，杀死原人，虽然善神与之激战并保留下了原人的种子（40年后化生一男一女，为人类之祖）。但世上也从此有恶蔓延，世人也注定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到善恶之战中。但最终善神将战胜恶神，将之清除，天地焕然一新而进入“分别之世”。届时世人不灭的灵魂都将接受末日之审判，为善者将进入光明、公正和真理的永恒王国；作恶者则被罚入地狱，过着黑暗和悲惨的生活；倘若心意不定，善恶参半，则被置于不上不下的“阴阳界”。那么，人类如何在末日审判中不被打入地狱呢？琐罗亚斯德提出了“三善”救赎说。指出人要善思，笃信阿胡拉·玛兹达，勿存恶念；人要善行，乐善好施，坚守教规；人要善言，不得说谎，严守口戒。但是，这只是一种引导，人们从善还是从恶，具有自由意志。所以，琐罗亚斯德教是一种彻底的个人宗教，他关注的是人类的道德而不是国家或者社会的整体命运。所以著名的宗教学家凯莱特由衷地赞叹：“但是所有这奇异的语言具有一种真正的伦理倾向。事实上，没有那种宗教比琐罗亚斯德教与道德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没有哪种宗教比它更坚决地强调道德不仅是习惯而且是永恒的事物。它植根于遥远的过去，而且指向无限遥远的未来。”同时，这种个人性的宗教又具有一种“普济主义”。对此，黑格尔的论述极为精当：“琐罗亚斯德的‘光明’属于‘意识的世界’……‘光明’不分畛域，不分彼此；太阳普照着善人和恶人、贵人和贱人。把同样的福利赐给一切的人类。”这种传播“光明”的努力，或许是波斯人竭力扩张，一统天下的原因。在这种宗教精神的激励下，波斯统治者实行着宗教宽容的政策。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宗教信仰看作只属于自己的特权；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反对甚至支持其他民族的宗教发展。

琐罗亚斯德教并非无源之泉，而是在融合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印度宗教道德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它又反过来对欧亚大陆各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琐罗亚斯德教末日审判的情节，神分善恶的影响，自由意志的观点，不塑神像的教规以及严守洁净的实践，都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另外，希腊哲学也从琐罗亚斯德教那里吸收了滋养并产生了独树一帜的米利都学派和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火”学说。鉴于此，人们把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犹太教相提并论，认为该教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而作为其载体的波斯帝国，也以其强大、宽容、融合和富庶为特征永驻于人们的记忆之中。